



2020 年届会

2019 年 7 月 25 日至 2020 年 7 月 22 日

议程项目 5(c)

高级别部分：发展合作论坛

## 国际发展合作的趋势与进展

### 秘书长的报告

#### 摘要

秘书长根据大会第 61/16、68/1、70/192 和 70/299 号决议提交本报告，供发展合作论坛审议。本报告将为定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在纽约举行的论坛高级别会议提供主要投入，以支持《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执行、评估和后续落实以及发展筹资后续行动。它概述全球的总体情况，说明国际发展合作格局的发展状况和挑战。报告还重点指出了若干领域，其中发展合作行为体在关键领域或部门加强努力有助于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能力，加快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十年的进展。



## 一. 引言

1. 国际发展合作——在财政资源、能力发展、技术开发和转让、政策变革行动和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各领域的合作——仍然是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一个有力和强大的手段。与此同时，持续的或新的和不断变化的挑战正在考验发展合作的不同行为体、机构和方式。灾害和气候风险增加、大流行病的风险、人口变化、能力薄弱以及国家和国际上日益严重的信任缺失可能会对那些已经落在最后面的国家和人口造成严重的影响。

2. 发展合作论坛是对国际发展合作最新趋势、进展和新问题进行务实审查的全球平台。2018 年论坛发出响亮的号召，要求发展合作在快速变化的趋势和挑战面前进行更迅速、更根本的变革，其中一些趋势和挑战的激烈程度在该论坛之后有增无减。虽然根本性变革是复杂的，但许多行为体的变革性政策和做法已经带来了成果。展望 2030 年，需要利用和扩大所有行为体和利益攸关方的最佳做法和成功创新，以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3. 本报告重点介绍了发展行为体目前优先考虑的一些领域，这些领域通过智能适应和更有力的承诺，可以充分释放发展合作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十年的潜力。报告中所载的分析应有助于产生可行的政策指导、产生支持创新的新证据以及促进同行学习、知识共享和更深入合作的机会。除了为 2020 年论坛提供主要的实质性投入外，本报告还将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 2020 年会议和经社理事会发展筹资后续行动论坛 2021 年会议的审议提供信息。

## 二. 全球发展合作情况及最新数据

4. 2018 年论坛提请注意需要加强所有类型的发展合作，包括金融和非金融合作的数量、质量和影响。与会者强烈呼吁确保发展合作更系统地侧重于资源最少、能力最薄弱的国家和人民。承认公共及私人投资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同时着重指出官方发展援助独特、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会者还强调了南南合作、三方合作以及能力建设和伙伴关系的其他方式所作的多样化、锲而不舍的贡献。下文概述 2018 年以来国际发展合作的相关趋势，以便为本报告的分析提供背景。

### 官方发展援助

5. 尽管官方发展援助显示出支持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但若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既定的现金流法计算，2018 年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总共下降了 4.3%。按经合组织新的赠款等值法计算，2018 年该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为 1 530 亿美元。2018 年相当于赠款的官方发展援助数字相当于该委员会捐助国合并国民总收入的 0.31%，仍低于将国民总收入的 0.7%作为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比率。与 2017 年相同的 5 个委员会成员，即丹麦、卢森堡、挪威、瑞典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在 2018 年实现或超额完成目标。作为官方发展援助不计入该委员会总额的非委员会成员，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分别将国民总收入的 1.10% 和 0.95% 作为官方发展援助。<sup>1</sup> 据报告，2016 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双边和多边气候融资为 380 亿美元。<sup>2</sup>

6. 尽管 2018 年官方发展援助支付总额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捐助国为难民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下降，但考虑到官方发展援助仍然远远低于承诺，且仍占发展中国家外部资金的很大一部分，这一下降令人担忧。2018 年，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下降了 2.1%，仅占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民总收入的 0.09%，而对此类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总收入之比的目标为 0.15%-0.20%。这一下降出现在其他形式的发展资金和资源绕过最不发达国家这个群体之际；例如，外国直接投资集中在少数几个最不发达国家，而汇款在大多数最不发达国家中发挥的作用有限。<sup>3</sup> 2018 年对非洲、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分别下降了 1.8%、8.9% 和 2.1%。

7. 总体而言，2018 年可列入国家方案的援助略微增加 0.3%，此类援助是提供者可以列入个别国家或区域方案的援助部分，受援国对此可能拥有重大发言权。然而，在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此类援助分别下降了 1.1%、7.2% 和 0.1%。可列入国家方案的援助不包括用于捐助国内部难民费用、人道主义援助、债务减免和行政费用。此类援助增加的原因是社会和经济部门的支出增加，抵消了对生产部门的官方发展援助下降的影响。对所有国家组教育次级部门的可列入国家方案的援助都有所增加。社会部门的份额接近或略高于官方发展援助支付总额的一半。

8. 自 2015 年以来，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优惠有所减少，尽管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的赠款有所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而言，所有部门的优惠都有所下降，特别是在经济部门。随着此类国家迈向毕业，所有发展伙伴都需要支持平稳过渡进程，以确保毕业不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可持续发展成果(见 E/2019/33)。

9. 最近的调查和监测活动提供的更多证据表明，官方发展援助的质量和效力有所提高，但情况喜忧参半。可预测性是有效发展规划的一项要求，但它正在下降。各国报告说，它们的发展伙伴提供的前瞻支出和执行计划有限，特别是在极其脆弱的情况下。然而，发展伙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前瞻支出计划中发展合作的比例从 2016 年的 71% 下降到 2018 年的 67%，这也表现在接受议会审

<sup>1</sup> 《2019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9.I.7)。

<sup>2</sup>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资金问题常设委员会，“资金问题常设委员会关于 2018 年气候资金流量两年期评估和概览的摘要和建议”，2018 年。

<sup>3</sup> 《2019 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外部发展融资的现状和未来——旧的依赖与新的挑战》(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20.II.D.2)。

查的份额下降。<sup>4</sup> 这些趋势共同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对它们的发展努力进行有效规划和编制预算的能力，对各国加强国家发展问责制的努力产生了负面影响。

10. 在接受调查的发展中国家中，约有一半有国家成果框架或类似的国家文件，以审查国际发展合作的业绩和成果，从而提高援助质量。<sup>5</sup> 然而，研究表明了发展中国家在引入国家主导的成果监测框架方面面临的困难，许多发展行为体使用自己设计的平行框架，使加强国家能力的努力遇到挑战，并导致对影响的衡量不一致；只有 14% 的发展中国家报告他们的合作伙伴使用相同的成果框架。事实上，有证据显示，自 2016 年以来，国家成果框架的一致性和使用程度总体上有所下降。2018 年，虽然 83% 的新项目的目标与国家优先事项保持一致，但只有 59% 的成果指标采用国家自主的成果框架，只有 50% 与国家的统计和监测系统保持一致。<sup>6</sup> 这一下降是由双边伙伴推动的，这些伙伴共同将数据差距和缺乏分类数据作为不使用国家主导框架的原因。

11. 在过去十年中，用于促进性别平等的官方发展援助的份额和数量都有所增加。用于促进性别平等的资金已经增加到历史最高水平，但仍然不足。许多双边发展机构在实施专门为残疾人设计的方案方面拥有相当多的经验，但将残疾问题纳入发展合作总体框架的主流仍然是一个挑战。

### 南南和三方合作

12. 南南和三方合作属于最重要、增长最快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形式，这反映在 2019 年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的成果中。它们有助于动员基础设施融资等领域的关键实施手段；资源调动和国际税务合作方面的能力建设；数据和统计方面的技术合作；适应气候变化；技术开发和转让。它们还有助于将发展合作的重点放在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等特殊处境国家上。

13. 南南合作建立在更广泛的伙伴关系层面上，涵盖了金融合作以外的支持，继续影响着更广泛的发展格局。约 68% 的方案国政府表示，它们向其他国家提供发展合作，如南南合作或其他同行交流平台。报告与南南合作伙伴就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科学、技术和创新交流信息和最佳做法的方案国政府略少，占 64%。<sup>7</sup>

14. 为支持建设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目前包括与 15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 171 份合作文件，<sup>8</sup> 估计已启动 2 631 个互联

---

<sup>4</sup> OECD and UNDP, *Making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More Effective: How Partner Countries Are Promoting Effective Partnerships – Part I of the Global Partnership 2019 Progress Report* (2019)。

<sup>5</sup> 调查结果将在 2020 年论坛调查中公布。

<sup>6</sup> 经合组织和开发署，《使发展合作更加有效：伙伴国家如何促进有效的伙伴关系——全球伙伴关系 2019 年进展报告第一部分》(2019 年)。

<sup>7</sup>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9 年对方案国政府的问卷调查。

<sup>8</sup> 新华通讯社，“事实简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新进展”，2019 年 3 月 19 日。

互通基础设施支持项目。<sup>9</sup> 2019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金融机构报告为“一带一路”倡议伙伴国提供价值44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sup>10</sup> 在2019年举行的气候行动峰会上，印度发起了促进具有抗灾能力的基础设施联盟，该联盟的重点是合作扩大具有抗灾能力的基础设施，支持大幅减少基础设施损失。其主要模式将是在治理和政策、新兴技术、风险识别和估计、恢复和重建、抗灾能力、资金和能力建设等领域建立伙伴关系。<sup>11</sup>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墨西哥利用其中美洲和加勒比基础设施基金(称为尤卡坦基金)，在该地区建立抗灾能力和支持可持续发展。<sup>12</sup>

15. 虽然无论从金融还是非金融的角度，都很难对全球的南南合作进行准确的估计，但一些行为体已集体采取步骤，从其南南合作活动中监测和制定最佳做法。2019年发布的一项研究评估了2016年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参与的1355项有关南南合作的行动、项目和方案。<sup>13</sup> 大多数项目是双边性质的，大部分项目侧重于加强社会部门的能力，特别是卫生方面的能力。三分之一的项目侧重于经济部门，如支持加强生产性部门。环保倡议的数量较少。

16. 许多非洲经济体的快速增长推动了积极提供南南合作的国家数量的增加。2018年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规划和协调局转为非洲联盟发展署，应有助于加强此类努力，以支持《2030年议程》和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其新任务赋予该组织在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和区域经济共同体提供关于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能力发展的知识推动的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方面的广泛作用。非洲大陆的南南倡议越来越多地在非洲内部实施，这突显了南南合作从共同的主人翁意识和团结意识中汲取力量的途径，促进了次区域和区域对共同目标的认同。

17. 最近对9个非洲国家的一项研究显示，2017年记录的300多项南南倡议涉及几种主要类型的合作。这些合作包括培训和技术援助、多部分支助以及项目融资，紧随其后的是技术转让。<sup>14</sup> 许多倡议的实质性重点是可持续发展目标9、目标8和目标3，以及和平与发展。目标10和目标5等其他领域得到的关注较少。

#### 私人融资，包括混合融资和慈善融资

18. 虽然对什么是混合融资的定义各不相同，但利用公共资本或慈善资本动员私营部门投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其中大部分资金是通过信贷和

<sup>9</sup> Refinitiv, “BRI connect: an initiative in numbers”, 2019。

<sup>10</sup> 同上。

<sup>11</sup> 见 <https://resilientinfra.org/>。

<sup>12</sup> 见 <https://globalmx.sre.gob.mx/index.php/en/international-cooperation/mexican-cooperation-beyond-the-eu/3-flagship-initiative-yucatan-fund>。

<sup>13</sup> Cristina Xalma and Silvia Lopez Cabana, *Report on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Ibero-America 2018* (Madrid, Ibero-American General Secretariat, 2019)。

<sup>14</sup> 开发署和其他作者，《第一份非洲南南合作报告》(2019年)。

风险担保以及多边捐助者筹集的，主要是向中等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委员会捐助者越来越多地倡导更好地利用官方发展援助作为私人投资的杠杆，以帮助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并通过发展融资机构提供更多资金，其中混合融资发挥着核心作用。2018年以来，加拿大、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联盟等双边大型捐助者启动了新的发展融资倡议和机构。<sup>15</sup> 发展融资机构报告称，2018年为价值60亿美元的私营部门项目提供了融资，这些项目利用了11亿美元的优惠资源，并利用了17亿美元的私营部门融资和24亿美元的此类机构的自有账户投资。<sup>16</sup>

19. 2018年论坛建议，随着混合融资的增加，应作出努力，确保弱势国家在国际发展融资中的总体份额不会下降，并确保社会部门不会资金不足。在《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原则的基础上，《2020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提出了以国家自主权、能力发展以及公平分担风险和回报为基础的混合融资五管齐下的建议。在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受冲突影响国家等国家部署混合融资和其他特别融资工具时，应谨慎行事，并符合关于发展合作的质量、效力和影响的既定原则。通过监测和评价系统收集的数据在这一领域仍然千差万别，对其是否足以显示影响存在关切。需要进一步作出努力，以改善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并改善从混合融资项目的最终受益者那里收集的信息。

20. 来自全球南方的私人融资正在发挥更大的作用。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增长，占2019年全球流量的近30%。2017年流向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南南投资占总投资的28%。区域投资中心带动了很大一部分区域内和南南外国直接投资。在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所有外部资金中，这类投资仍然是规模最大、波动性最小的投资之一。这些投资还伴随着更多的资金流动，主要通过南方的区域银行进行。<sup>17</sup>

21. 向发展援助委员会报告的私人慈善捐助者在2018年为发展捐款65亿美元。这只是39个国家26万个基金会监管的1500亿美元年度慈善支出估计数和1.5万亿美元资产的一小部分。<sup>18</sup> 在世界范围内，教育是慈善事业的头等大事。随着慈善机构数量的增加和地域范围的扩大，在支持可持续发展努力方面的新问题、新方法和新工具不断涌现。此外，各国研究的大多数基金会都根据不同的效率和效力目标开展自己的方案和活动，而不仅仅是提供赠款。关于慈善支出的长期可持续性和影响以及需要加强执行伙伴的能力建设的问题仍然存在。<sup>19</sup>

<sup>15</sup> Valentina Barbagallo, *Concord Aidwatch 2019: Leaving No One Behind – Time for Implementation* (Brussels, Concord Europe, 2019)。

<sup>16</sup>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others, *DFI Working Group on Blended Concessional Finance for Private Sector Projects: Joint Report – October 2019 Update* (2019)。

<sup>17</sup> 《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经济特区》(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9.II.D.12)。

<sup>18</sup> Paula D. Johnson, “Global philanthropy report: perspectives on the global foundation sector”, 2018。

<sup>19</sup> Synergos, “Capacity-building across borders: a strategy for funders and partners”, September 2018。

## 22. 行动要点和建议包括：

(a) 优惠资源对于加强落在最后面的国家和人民实现《2030年议程》、《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巴黎协定》和《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的能力至关重要。各国应紧急加倍努力，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确保可用的官方发展援助资源有效用于资源最少、能力最弱的国家，如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

(b) 国家主导的进展要求所有发展合作行为体在获得关于商定的合作方式和活动的前瞻性信息的基础上，更好地与各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系统保持一致；

(c) 南南和三方合作，包括区域和区域间合作，其多样性、经验和影响继续扩大，可以通过改进行为体之间的知识共享和评估来加强其影响；

(d) 发展合作行为体必须确保私营部门的参与具有可持续的发展影响，并根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以及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优先事项、更强有力的利益攸关方参与和循证对话，帮助满足贫困和脆弱社区的需求。

## 三. 加强国家调动资源的能力

23. 国际发展合作可以帮助加强国家以各种方式调动和管理资源的能力，2018年论坛表明国家发展合作政策和相关推动因素是这方面的重要工具。发展合作可以支持各国建立国家制度，并促进以全政府方式调动资源(国内、国际、公共、私人)，以实施其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它还可以加强为私营部门发展制定法律、政策和基础设施的能力，以及支持累进税制的税务管理。能力建设还有助于优先加强社会服务的资源调动工作和改善优质服务提供，这也将有助于提高纳税积极性。

### 国家所有权和发展合作推动者的作用

24. 在调查活动中，2020年论坛研究各国如何运用国家发展合作政策落实《2030年议程》和发现改善合作的机会。在参加调查的55个国家中，64%的国家制定了发展合作政策。在制定了国家发展合作政策和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中，86%的国家确认两者之间基本一致或高度一致，大多数国家报告两者之间高度一致。<sup>20</sup>

25. 绝大多数制定了国家发展合作政策的国家提到发展合作的多种来源，如优惠资金、赠款和贷款(78%)；作为其他类型融资催化剂的官方发展援助(81%)；南南和三方合作(86%)；技术合作和其他形式的能力建设(92%)。提到私人金融的次数较少(58%)。因此，这些政策以及相关政策和实践可以为《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所呼吁的国家综合筹资框架的设计和使用提供信息。

<sup>20</sup> 调查结果将在2020年论坛调查中公布。

26. 各国正在利用其国家发展合作政策鼓励外部伙伴帮助加强国家调动和管理资源的能力，将其作为各种商定活动的组成部分。例如，81%的调查对象拥有涵盖使用国家采购和公共财政管理系统的政策，同样比例的调查对象鼓励使用国家成果框架。此外，各国的政策在一系列指标中反映了普遍较高程度的国家自主权，包括确定国内资源调动的优先顺序；为国家一级政府及其部委以及地方政府制定目标；说明优先选择的模式。

27. 高质量的公共财政管理系统对于确保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至关重要。然而，最近的监测数据显示，各国此类系统的增强并不一定促使发展伙伴增加对这些系统的使用。<sup>21</sup> 更强的审计、采购和确保此类系统响应性别平等目标的能力是优先事项。在那些更经常使用公共财政管理和相关国家制度的情况下，与发展中国家伙伴进行更长期的接触，并将更大份额的发展合作资源输送到公共部门。<sup>22</sup> 这表明坚定、持续的发展合作的重要性，这种合作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建设能力和知识。

### 加强国内资源调动能力

28. 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变革及其对税收政策和管理的影响，只会加速对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内资源调动的国际发展合作的需要。

29. 正如《2020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所述，2018年用于调动国内收入的官方发展援助比2017年跃升43%，达到2.75亿美元。尽管有这一涨幅，但其水平仍低于2016年记录的3.01亿美元。虽然应该增加官方发展援助的分配，但南南和三方合作可以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在这一领域提供财政资源、工具和能力支持，包括通过区域和区域间税务组织提供支持。

30. 发展中国家及其外部合作伙伴一直呼吁加强在就国内资源调动问题提供支持方面的协调。截至2019年，经合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税务监察员无国界联合方案参加了审计，使收入增加了4.8亿美元。“亚的斯亚贝巴税收倡议”提高了国内资源调动在国际合作中的重要性，并产生了大量资源，随着该倡议调整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不断变化的机构格局，可以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税务合作平台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汇聚在一起，开展更协调有效的税收能力建设活动，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并有余地与区域和区域间税务组织进行更密切的合作。

### 有利于私营部门发展的环境

31. 在能力有限的国家，发展合作应支持各国政府创建有利于私营部门发展的环境，以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sup>21</sup> 经合组织和开发署，《使发展合作更加有效：伙伴国家如何促进有效的伙伴关系——全球伙伴关系2019年进展报告第一部分》(2019年)。

<sup>22</sup> 同上。



32. 最近估计，旨在加强私营部门发展有利环境的官方发展援助在 2015 年达到 99 亿美元，与用于教育的官方发展援助支出相当，高于当年用于水和环境卫生的支出。<sup>23</sup> 研究人员发现，仍有空间增加官方发展援助支出，特别是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支出，并改进其举措的协调和排序。他们还发现，如果此类官方发展援助资金更多地直接分配给加强扶持性环境，而不是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分配，此类援助的可持续性和影响可以得到提高。

33. 作为建设有利环境工作的一部分，还需要通过全球合作等途径，解决犯罪、腐败和非法资金流动问题。与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反腐败对策相一致的广泛、可预测的国家政策框架，对于确保人人享有医疗保健、水、教育和其他重要服务也至关重要。<sup>24</sup>

### 在国家以下各级建设调动和管理资源的能力

34. 为了充分满足其融资需求，各国政府将必须加强地方财政的关键组成部分，包括自有来源创收(如使用费、地方税)以及资产和财务管理，以及地方一级利用公共和私人长期融资来源的能力。

35. 地方政府将受益于在地方财政所有关键领域加强国际发展合作。特别是，地方当局将需要建设技术和机构能力，以改善税收；确保及时有效地购置、维护和处置有形资产，如土地及建筑和基础设施；提出中期预算，提高信用程度，以调动长期资金来源。能力建设努力还应着力改善地方金融利益攸关方，包括不同级别的政府之间的沟通、协作和协调。例如，发展合作通过引入基于绩效的赠款，包括根据先前商定的基准对地方政府的支出进行年度绩效评估，帮助增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支持。<sup>25</sup>

36. 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贷款、同行学习和知识交流网络等途径，南南合作正在成为地方一级日益重要的因素。据估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 70% 的城市参与同行交流和跨境伙伴关系。<sup>26</sup>

37. 联合国系统向各国政府和地方当局提供能力建设支持，以扩大地方财政的关键组成部分。联合国的支持帮助设计了地方增收工具和计划，改善了资产管理和公共财政管理，帮助地方政府确定了适当的服务提供和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机制，并提高了它们的信用程度，以利用公共和私人长期资金来源。

<sup>23</sup>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The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donor spending and links to other catalytic uses of aid”, March 2018.

<sup>24</sup> Martin Polaine, 《公共部门预防腐败示范的良好做法：支持执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经验教训研究》(开发署, 2018 年)。

<sup>25</sup> Daniel Platz 和其他作者, 《最不发达国家城市可持续发展筹资》, (联合国和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 2018 年)。

<sup>26</sup> OECD, *Reshaping Decentralize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The Key Role of Cities and Regions for the 2030 Agenda* (Paris, 2018)。

38. 在联合国发展系统改革的背景下，各国对更多支持国家资源调动能力的请求为重新配置的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设计提供了信息，国家工作队现在包括经济学家以及伙伴关系和发展融资专家。这些变化和其他变化应使驻地协调员制度能够更好地支持会员国促进可持续金融系统、利用公共财政和吸引私人投资，以帮助实现国家优先事项。

39. 行动要点和建议包括：

(a) 应加强投资和能力支持，以加强国家调动和管理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国内和国际、公共和私人——的努力，特别是对资源最少和能力最弱的国家而言；

(b) 在已经到位的情况下，国家发展合作政策以及相关政策和实践应为国家综合筹资框架的设计和使用提供信息；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此类框架的概念应有助于发展合作的质量、效力和影响；

(c) 可以更好地协调促进国内资源调动的发展合作，并使其更具相关性，具体的途径有：更坚定地承诺国家当家作主；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最有效支持手段的强有力的证据基础；提高税制公平性的行动；

(d) 对国家一级私营部门发展有利环境的支持，必须更加符合国家优先事项和现实，并遵循更好的发展合作活动证据基础的指导；

(e) 发展合作应有助于加强地方财政的关键组成部分，包括自有来源创收、资产和财务管理，以及地方一级利用公共和私人长期资金来源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 四. 通过以风险为指引和气候智能的发展合作建设复原力

40. 2018 年论坛传递的最强烈信息之一是，发展合作必须更加以风险为指引，有更“聪明”的抗灾能力，与气候行动有更强的联系。在秘书长《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筹资战略(2018-2021 年)中，发展合作、复原力和气候行动之间更好的协同增效也被列为优先事项。气候行动与减少灾害风险之间的内在联系需要连贯的政策方法，将实现《2030 年议程》、《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巴黎协定》和《仙台框架》的优先事项结合起来，并使发展合作行为体联合起来开展国家主导、有针对性和协调一致的行动。总体趋势概述如下。

##### 减少灾害风险

41. 在全球层面，《仙台框架》具体目标 F 呼吁大幅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水平，以支持其减少灾害风险的国家行动。然而，灾害风险的生成速度超过了减少风险的努力(见 A/74/248)。发展援助委员会最近的数据显示，2005 至 2017 年间，对减少灾害风险的支持仅占发展援助总额的 3.8%。<sup>27</sup> 减少灾害风险的大

<sup>27</sup> OECD, *Assessing the Real Cost of Disasters: The Need for Better Evidence - OECD Reviews of Risk Management Policies* (Paris, 2018)。

部分资金用于事后活动，而事前措施，如缓解导致灾害的潜在脆弱性，以及通过加强卫生系统或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复原力，得到的关注较少。<sup>28</sup> 鉴于缺乏关于对减少灾害风险具体支持的可靠数据，已制定了发展援助委员会减少灾害风险政策标志，将其作为更好地衡量减少灾害风险的发展合作并将其纳入主流的一种方法。

42. 在区域一级，通过南南合作等方式，在加强备灾和交流最佳做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人道主义援助中心通过政策咨询、研究、战略学习和信息交流，积极促进区域合作，以促进成员之间有效减少灾害风险。该区域也越来越重视开展联合演习，以改善备灾情况，为此加强风险管理能力，<sup>29</sup> 并采取全面办法解决与灾害相关的水、粮食不安全和健康无保障问题。<sup>30</sup>

43. 发展合作中的技术开发和转让对于支持各国应对风险和建设复原力仍然至关重要。研究表明技术支持的“端到端”预警系统在降低风险和加强灾害应对方面的效用。无人驾驶飞行器(无人机)可以通过监测、测量和摸底调查灾害风险来支持备灾。区块链技术已在紧急情况下用于管理现金转移和公民身份识别。通过利用技术创新，各国政府可以更有能力有效预测、准备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成倍增长的灾害威胁。此类技术的部署和采用必须适应各国的情况和能力。

### 气候行动

44.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13.2 要求将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纳入国家政策、战略和规划，而具体目标 13.A 则要求发达国家缔约方履行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一部分作出的承诺，以实现到 2020 年每年从各种渠道共同筹资 1 000 亿美元，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45. 支持环境可持续性和气候变化的官方发展援助总水平一直在增加，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拥护者，包括法国、德国、冰岛和日本。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还通过多边开发银行和基金输送大量资源，如通过资本补充输送资源，这在为有关气候适应和缓解的重大项目提供资金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sup>31</sup> 例如，截至 2020 年 2 月，绿色气候基金已经筹集了 82 亿美元的确认捐款。<sup>32</sup> 该委员会成员对生物多样性、特别是海洋产生越来越大的兴趣，尽管通常一开始兴趣都较低。<sup>33</sup>

<sup>28</sup>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2019 年全球减轻灾害风险评估报告》(日内瓦，2019 年)。

<sup>29</sup> 同上。

<sup>30</sup>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Coordinating Centre fo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on Disaster Management, *ASEAN Risk Monitor and Disaster Management Review (ARMOR)* (Jakarta, 2018)。

<sup>31</sup> OEC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Report 2019: A Fairer, Greener, Safer Tomorrow* (Paris, 2019)。

<sup>32</sup> 见 [www.greenclimate.fund/about/resource-mobilisation/irm](http://www.greenclimate.fund/about/resource-mobilisation/irm)。

<sup>33</sup> OECD, *Greening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Lessons from the OEC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The Development Dimension Series (Paris, 2019)。

46. 气候缓解受到了大量关注，有时会使对其他包括环境污染和荒漠化在内的与气候相关的关键问题的关注减少。获得气候适应资金仍然是一个挑战。最新报告显示，大约 93% 的气候资金分配给缓解工作，而有跟踪记录的气候资金中有 5% 用于适应工作。<sup>34</sup> 尽管改善复原力的整体投资回报率非常高，但这一趋势依然存在。每投入 1 美元用于适应，可产生 2 至 10 美元的净经济效益。<sup>35</sup> 可能需要调整国际金融机构确定融资项目和评估资格的方式。

47. 尽管取得了进展，但许多发展合作行为体仍然缺乏使其活动符合《巴黎协定》的适当战略和激励措施，官方发展援助仍被用于支持破坏环境的活动，如化石燃料能源。<sup>36</sup>

#### 为支持《2030 年议程》、《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巴黎协定》和《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开展更统一的规划和行动

48. 国家发展合作政策和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在为各国指明方向，引导国际发展合作。然而，还有进一步的空间，可以使此类政策和战略与气候和减少灾害风险战略和计划更好地保持一致，以确保它们取得成果；带来连贯性；加强国家自主权；并为发展合作行为体之间在气候和减少灾害风险方面的行动提供明确的指导和合作机会。

49. 截至 2019 年 5 月，已有 91 个国家报告制定了符合《仙台框架》具体目标 E 的国家灾害风险战略(见 [A/74/248](#))。截至 2019 年 9 月，90 多个发展中国家正在编制国家适应计划。几乎所有《巴黎协定》缔约方(197 个缔约方中的 184 个)都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包括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在内的 53 个国家正在制定长期战略。<sup>37</sup>

50. 融资仍然是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的重大挑战。使国家气候和减少灾害风险目标与发展合作政策和做法保持一致，提供了将所需资源用于明确界定的优先事项的机会。然而，许多国家尚未制定国家发展合作政策，关于减少灾害风险和气候行动的规划框架、工具和战略是否反映在国家发展合作政策和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信息有限。

51. 除了根据国家优先事项和国家能力提供支持外，发展行为体还应将重点扩大到传统的发展合作领域之外，以涵盖对减少灾害风险和气候行动至关重要的森林、生物多样性和海洋等部门。南南和三方合作仍然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方式，可以凸显农业、可再生能源和水资源等领域的创新。

<sup>34</sup> Barbara Buchner, “Global landscape of climate finance 2019”, November 2019.

<sup>35</sup> 全球适应问题委员会, 《立即适应: 气候复原力领导力全球呼吁》(2019 年)。

<sup>36</sup> OECD, *Aligning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Climate Action: The Only Way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Dimension Series (Paris, 2019)。

<sup>37</sup> Alister Doyle, 《热浪腾腾: 盘点全球气候雄心——2019 年国家自主贡献全球展望报告》(开发署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 2019 年)。

52. 可在区域一级提供解决方案，使气候和减少灾害风险政策更好地与发展合作保持一致。自 2010 年以来，一些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制定了联合国行动计划，以加强减少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政策之间的一致性。在这些计划的基础上，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制定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太平洋复原力发展框架。该框架有助于动员并确保为太平洋岛屿国家的自我界定的需求和优先事项提供充足、可持续和及时的支持。

53. 随着灾害的严重程度不断增加，城市和社区正在成为以风险为指引和气候智能的发展合作的主要参与者。例如，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达累斯萨拉姆，发展合作伙伴——当地学术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坦桑尼亚科学技术委员会、坦桑尼亚红十字会、世界银行和社区成员——参与了一个覆盖大约 350 万城市居民的广泛的社区风险摸底调查项目，以支持事前应急准备计划。<sup>38</sup> 通过发展合作增强地方行为体的能力，可以促成对气候变化和灾害的创新快速反应行动。

54. 行动要点和建议包括：

(a) 所有国家都可以而且必须做更多工作，以加强发展合作政策和做法与《巴黎协定》和《仙台框架》所产生的财政和非财政承诺的一致性。这包括确保发展合作更加灵活，对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不断变化的挑战做出更快速的反应；

(b) 将气候行动和减少灾害风险结合在一起以实现更有效的发展合作的新方法，包括通过区域发展合作以及南南和三方合作，应该会激发更广泛的创新和行动；

(c) 及时和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灾害，需要发展中国家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技术转让和吸收，包括通过加强能力建设；

(d) 发展合作应促进地方一级的创新，使所有利益攸关方能够为气候行动和减少灾害风险制定地方解决方案。

## 五. 支持加强国家数据和统计系统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55. 2018 年论坛得出结论，必须增加投资和能力支持，以加强各国规划、实施、监测和审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数据和统计能力。要取得进展，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就需要高质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在各级得到充分的分类，同时数据得到有效地传播和使用。本节审查在努力促进发展合作、投资和国家数据统计伙伴关系方面的最新进展，突出说明了需要进一步采取行动的领域。

56. 2017 年为数据和统计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为 6.89 亿美元，仅为全面实施开普敦可持续发展数据全球行动计划所需资金的一半。截至 2019 年，只有 89 个国家统计发展战略获得了充分资金，大部分是高收入和中上收入国家。这种持续、长期的投资不足阻碍了各国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一些人担

<sup>38</sup>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2019 年全球减轻灾害风险评估报告》。

心，数据发展合作往往与捐助者的投资有关，而不是与更广泛地建设国家能力有关。<sup>39</sup>

57. 人口和社会统计一直是发展合作的首选统计领域，占 2017 年承付总额的 35%，部分是由向 2020 年人口普查提供的支持推动的。对环境 and 多部门统计数据的支持从 2016 年的 14% 下降到 2017 年的 8%，这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特别重要，只有一小部分国家有充分的资金并实施了国家统计发展战略。<sup>40</sup>

58. 发展合作项目越来越多地支持性别统计。在双边捐助者中，2015 年至 2017 年期间用于统计的承付款中有 11% 将性别数据作为目标，而在 2010 年至 2012 年期间，这一比例仅为 3%。<sup>41</sup> 鉴于按性别划分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覆盖面仍然存在重大差距，需要作出更有力的发展合作承诺才能维持这一趋势。<sup>42</sup>

59. 在过去十年中，捐助者大力推动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残疾数据和统计方面的能力和技术支持。尽管如此，在可比和高质量数据的可获得性方面持续存在的限制给这一领域带来了持续的挑战。

#### 国家统计局和主管部门的技能和技術增强

60. 编制 200 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统计数据给各国带来了巨大负担，特别是那些能力低、脆弱性高的国家。大多数国家无法定期收集一半以上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数据。<sup>43</sup>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和结果的高度关注虽然重要，但可能会给那些已经在努力改进传统数据源和统计信息的国家统计系统带来压力。<sup>44</sup>

61. 缺乏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的分类数据是一个共同的挑战。现有数据集的数据稀缺和样本量有限，给识别和监测那些落在最后面的人的状况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传统的数据收集工具往往是为了评估总体国家成果而设计的，所依据的方法可能不容易适应对人口群体的广泛分析。此外，落在后面的人往往是最不可能被统计和反映在国家统计数据中的。政治和实际挑战可能会阻碍查明那些遭遇不平等和歧视的人的努力。<sup>45</sup>

<sup>39</sup> Secretariat of the Partnership in Statistics for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partner report on support to statistics: PRESS 2019”, 2019。

<sup>40</sup> 同上。

<sup>41</sup> 同上。

<sup>42</sup> Jennifer Ross 编，《重视每一名妇女和女童：2018 年度报告——执行阶段》(纽约，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2019 年)。

<sup>43</sup> 《2019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19.I.6)。

<sup>44</sup> Bern Network, “The Bern Network: a global alliance to strengthen development data – financing more and better data to achieve the SDGs”, July 2019。

<sup>45</sup>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国家工作队业务指南》，临时草案，2019 年 3 月 18 日。

62. 加强国家统计能力应会使国家作出反应更为迅速和更具包容性的决策，特别是在由全面协商进程驱动和国家统计当局发挥明显作用的情况下。通过促进按照国际标准编制高质量的统计数据，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提供关于弱势群体的公正信息。

63. 国家统计局在将高质量数据与决策联系起来以及收集和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数据方面的作用，使其成为关键行为体，需要有保障的资源，并日益成为国际合作的对象。这对于不断扩大的数据生态系统中的新技能和新技术尤为重要。这包括建立促进定期活动、专家网络以及数据生成者和数据使用者之间对话的知识中心。

64. 随着日益多样化的新数据行为体和工具的出现，国家统计系统必须学会创新、现代化和适应。大数据，包括地理空间信息，为填补数据空白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但它们需要必要的技能和资源来管理它们。数字平台、众包以及移动和基于云的技术可以提供低成本的数据收集方式，同时让边缘化社区参与《2030年议程》。<sup>46</sup> 然而，它们的使用也是具有挑战性的，需要对能力和适当的体制环境进行投资，以充分利用机会并降低与这些来源和工具相关的风险。

65. 整个国家统计系统的工作人员需要掌握数据科学家的技能，以链接、集成和分析来自不同来源的大量数据。改进服务交付的数据驱动算法、机器学习和预测技术都是创新，通过这些创新，不同的数据社区可能会对进展作出贡献。除了这些努力，统计局和整个政府的技术基础设施也必须升级，以便行政和其他数据源以及新技术不仅支持统计工作，而且支持政府决策和服务交付。

#### **创新伙伴关系参与数据和统计，包括参与新数据来源方面工作**

66. 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创新统计筹资机制正在不断出现。伯尔尼发展筹资数据网络倡导建立一个全球多利益攸关方联盟，确保发展筹资数据的质量，包括更好地确定需求；改善投资；加强国家一级的协调；将对各国的国内外财政支持联系起来。该网络打算在 2020 年的联合国世界数据论坛上提出一个筹资框架和支助倡议，以更好地调整和巩固对国家统计计划的筹资反应。

67. 在建立数据和统计伙伴关系方面，许多新举措正在产生重要的经验教训和成果。2019 年启动的“当下数据倡议”将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可持续发展数据全球伙伴关系、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和世界银行聚集在一起，通过合作和伙伴关系、技术和能力支持以及信息共享，增加对提高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的及时性、覆盖率和质量的稳健方法和工具的可持续使用。联合国全球平台是另一个创新的数据驱动型合作伙伴关系：它利用广泛的公共和私营部门数据集和资源，包括来自全球大型科技公司的数据集和资源，在云服务生态系统的基础上，支持在开发官方统计数据和衡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方面的国际合作。

68. 与选定国家的统计当局合作建立知识和能力建设中心似乎是一种很有前途的做法。例如，墨西哥的性别统计全球英才中心是一个将墨西哥国家统计和地

<sup>46</sup> 同上。

理研究所、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和全球专家汇聚在一起进行性别统计合作、知识共享和创新的平台。此种中心可以通过以下做法来支持国家努力：知识和最佳做法交流；培训国家专家；宣传统计在具体政策领域中的作用；支持各国优先事项的方法创新，包括在使用新的数据源和工具方面的创新。

69. 在为改善数据而建立的创新伙伴关系中，一项重要原则应该是确保预期受益者有意义地参与数据收集和分析。这可以通过为多利益攸关方开放空间，并将代表可能被落在后面的人的组织和协会纳入其中来实现。这种参与性数据收集和分析应包括儿童和青年的观点和经验。

70. 行动要点和建议包括：

(a) 应对在《2030年议程》、《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巴黎协定》和《仙台框架》方面取得进展的数据挑战，需要大力推动加强能力和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

(b) 所有类型的发展合作应有助于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家需求和国家统计计划加强国家统计系统并使其现代化，包括填补传统数据质量方面的重大差距；

(c) 发展合作可以支持国家统计系统最大限度地利用新技术和不断变化的数据生态系统带来的机会；

(d) 发展合作应通过英才中心等途径，协助展示和扩大促进技术援助、最佳做法交流以及南南和三方合作的创新数据和统计伙伴关系。

## 六. 通过协商、监测和审查加强信任并交付成果

71. 2018年论坛呼吁发展合作行为体为可持续发展的“参与手段”带来更多的创新和更有针对性的行动。使从议会到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等不同行为体都能够有意义地参与发展合作和相关努力，有助于在各级加强集体能力和对国家可持续发展进程的信心。这包括对发展合作的影响进行监测、审查和评估，以促进总体透明度和问责制，并有助于确定并最终加强发展合作对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贡献。

### 与利益攸关方进行有意义和透明的协商、能力建设和审查

72. 在有关发展合作的相互竞争的紧迫事项和可持续发展面临不断变化的挑战的背景下，各国政府需要让所有发展伙伴参与国家可持续发展进展的执行、审查和后续行动。透明度和问责制水平低且停滞不前，可能会导致对发展合作的怀疑增加，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削弱可持续发展的成功机会。引入重要观点以促进有意义的磋商和审查，不仅能建立更广泛的公众对《2030年议程》的自主权，而且还能增进信任，促进以不同行为体的专业知识为参考依据取得更好的成果。



73. 发展合作行为体将青年、老年人和移民等可持续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排除在其协商、监测和活动之外，这是它们的损失并为它们带来风险。青年是一个关键群体，在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这一部分人口增长特别快；最不发达国家应考虑到他们的潜在贡献，这些国家的总人口(所有此类国家的总和)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其他地区人口增长速度的 2.5 倍，到 2050 年人口将翻一番，达到 19 亿人。在其他区域，老年人的数量正在上升，这对经济和社会的结构产生影响。最近国际移民的较高人数——2019 年估计为 2.72 亿人——也表明作为可持续发展努力的一部分，需要更多地关注移民的需求和能力。

74. 作为确保问责和监督的重要行为体，议员在支持包容性的全政府和全社会发展合作办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制定发展合作政策的国家中，只有 39% 的国家在实施此类政策前由议会对其进行了正式审查，自 2018 年以来，向议会提交发展合作政策进展报告的国家数量有所下降。

75. 让私营部门参与的发展合作项目需要更多地接纳国内利益攸关方的观点，以确保可持续发展成果。有关包容性协商和监测的各种挑战已经出现。其中包括对公共资源的使用缺乏保障措施；不够重视具体的成果和结果，特别是为了使那些落在最后面的人能够受益的成果和结果；相关项目的透明度、问责制和评估有限。根据对 919 个与私营部门相关的发展合作项目的审查，只有 13% 的项目让国家政府进行了参与，其他利益攸关方参与的项目甚至更少。在所研究的项目中，只有一小部分(不超过 5%)明确提到农村、偏远或服务不足地区，或提到针对贫困或低收入人口的目标或造福妇女的目标。<sup>47</sup>

76. 追究行为体责任的国家机制可以巩固政府、国内行为体和受益者及其发展伙伴之间的信任。在这方面，国家发展合作论坛可以为合作伙伴提供一个讨论问题、审查进展和相互学习的平台。2020 年调查的数据显示，大约一半的发展中国家答复者举办了此类论坛，82% 的答复者认为论坛在实现其目标方面高度或中度有效，大多数答复者同意论坛可以帮助在合作伙伴之间建立信任。

77. 然而，此类论坛要发挥效力，需要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并为问责、透明度和成果监测提供真正的机会。经验表明，许多此类论坛在理论上是多利益攸关方，但在实践中往往只与范围狭窄的利益攸关方接触——主要是政府和国际发展合作伙伴，而不是所有行为体。<sup>48</sup> 鉴于发展合作行为体日益多样化，需要加强其他利益攸关方对论坛工作的参与，这可能是发展合作伙伴的优先领域。

78. 论坛还充当对照目标审查进展情况的一个平台。在国家发展合作政策中使用目标对于有效监测和审查其执行进展情况至关重要，利益攸关方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监测和审查进展情况也会受到发展合作信息系统有效性和全面性程度的影响。许多国家发展合作政策和相关论坛继续主要关注政府各部委

<sup>47</sup> Global Partnership for Effectiv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Effective private sector engagement cooperation through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ssues Paper: Background for Consultations, 2019.

<sup>48</sup>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展合作论坛调查结果报告：发展合作方面的国家相互问责和透明度”，2018 年 5 月。

的业绩，较少关注其他发展合作行为体在实现目标方面的业绩。因此，发展合作信息系统可能仅限于少数行为体的一小部分目标核心，这不能反映或支持发展合作行为体和活动日益增长的推动力。

### 加强各级发展合作评估和学习的包容性机会

79. 自愿国别评估已成为审查《2030 年议程》进展情况的重要工具。自 2016 年以来，142 个国家在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上介绍了它们的评估。评估表明，关于包括发展合作在内的执行手段以及数据分类的证据和报告有限，仍然是许多国家(如果不是所有国家)面临的一些关键挑战。为此，2018 年论坛调查研究建议，多利益攸关方协商和国家主导的调查评估应为自愿国别评估的准备和后续行动提供信息。促进有效发展合作全球伙伴关系的监测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方案国家中，约有一半正在利用有效发展合作的相互评估作为其评估的参考依据。

80. 第五次最不发达国家部长级会议将于 2021 年在多哈举行。发展合作行为体可以利用会议和相关筹备工作来应对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现有和新出现的挑战，包括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重结构性障碍；对经济和环境冲击的高度脆弱性；人口快速增长，而人力资本水平低下。在将涉及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国家、区域和全球实质性评估融合在一起的筹备进程的基础上，会议最后将提出一项新的最不发达国家十年行动纲领，该十年也是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十年。

81. 充满挑战的全球环境正在加剧国际发展合作的困难局面。然而，发展合作的不同行为体正在展示对其一些核心规范的持续承诺，同时调整政策和做法，以在《2030 年议程》、《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巴黎协定》和《仙台框架》方面取得成果。本报告突出说明了这些总体趋势，并确定了加强发展合作努力可以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进展的关键领域，在这些领域内，发展合作在行动十年中可以成为规则的改变者。论坛保持其作为联合国全球平台的独特作用，对国际发展合作的这些最新趋势、进展和新问题及其影响进行循证、平衡和包容的评估。2020 年注重行动的会议将提供一个机会，以探索前景，确定并推动所有行为体和利益攸关方的最佳做法和成功创新，以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82. 行动要点和建议包括：

(a) 加强与所有利益攸关方进行发展合作协商、监测和评估，可以在支持各国可持续发展优先事项、建立信任和增强成果可持续性方面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

(b) 关键行为体，如议员、包括妇女和青年领导的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地方政府以及其他机构，需要有意义和系统地参与；

(c) 有必要加强对私营部门参与的协商、监测和评估方面的问责，以确保其贡献促进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

(d) 可以在准确反映当代发展合作现实的全面参与以及监测和讨论进展情况的强大数据和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加强对国家发展合作论坛的支持；

(e) 部长级会议为发展合作行为体提供了一个机会，以加强其承诺，包括通过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的创新模式、活动和伙伴关系，首先帮助落在最后面的人；

(f) 论坛将铭记挑战，为机遇做好准备，在汇聚日益多样化的发展合作行为体并规划未来道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